

◀ (上接 3 版)

从长期看，我们不必执着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应该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那么，是不是说经济增长速度真的不重要了？我们是不是要减少要素投入，完全依靠创新拉动经济增长呢？答案则不尽然。中国经济体量大，其惯性也是巨大的。要从目前的现实状况跨越到主要依靠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中间存在一个必经的过渡期，而且这个过渡期可能会比较长。

创新能力的培育受教育、文化、制度建设等诸多因素制约，不可一蹴而就。我们需要在发展中实现创新转型，增速绝不能掉得太快，更不能把原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一下子全部抽掉。

2008 年，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率先提出“腾笼换鸟”的概念。但是，一段时间“新鸟”迟迟没有进笼，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却已转移到了东南亚、南亚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急于转型，无奈却客观为自己培养了若干竞争对手，瓜分走了我们一部分国际贸易市场与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文汇报：近年来，经济学界对于产业政策“好”与“不好”的争论很是热闹。由于经济政策的实施具有不可实验性，我们似乎永远无法知道，倘若一项政策没有实施，那该是怎样一番天地。您认为，这些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是否存在积极意义？

洪永森：一项经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对经济有无效果，或者效果有多大，不仅仅取决于政策本身的设计，还取决于实施政策的时机、环境、具体条件，有无配套措施，等等。例如，减税等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经济下行、需求不足时可能有效，但在经济过热时则可能有反向效果。政策效应评估是一道难题。

计量经济学有一个专门的领域，被称为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主要是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与工具，在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政策进行量化分析，测度其实施后对某个群体、某个行业或某个地区的“因果”影响。的确，经济政策的实施具有不可实验性，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的核心便在于尽量客观地估计无法观测到的虚拟事实，即政策没有实施

的情况下的经济状态。某项政策的效应可测度即为政策作用下的实际效果与虚拟事实之差。

例如，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南加州大学教授萧政提出了一个基于面板数据的政策评估方法，并应用于评估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关系。经过科学的量化分析，萧政教授得出结论，虽然回归祖国后香港经济并没有显著增长，但是内地和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对香港地区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约为 4%。

经济政策争论本身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启发公众的思考。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用数据与计量方法对政策的效果进行客观评估，“让数据说话”，并分析解读其原因，以提高政策设计的科学性与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管理与文化软实力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文汇报：对于大学而言，本科教育具有基础地位。有人说，在大学的职能中，科研、社会服务等职能完全可以由科研院所来发挥，唯独本科教育这项职能，任何社会机构都无法取代。于是，校园里没有本科生的教育机构很难被视为主流。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未设有本科，是否也遭遇了类似的尴尬？

洪永森：尴尬在所难免，例如，学校一些部处机关发通知时，常常会把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漏掉。本科教育确乃大学之“本”。所以，王亚南经济研究院要求其教师一定要积极参与到本科教学、本科生培养当中去。

2011 年，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与经济学院合办了一个全英文教学的经济学专业本科国际化人才培养试点班。现在，已经在经济学院五个系开办了五个本科专业的全英文教学国际化试点班，每个班有 40 名左右学生。这里所谓的“全英文教学”是指专业课程全英文授课，其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进行国际交流、合作与竞争的经济专门人才，甚至未来成为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与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我们希望若干年内，专业课全英文授课的范围可以扩展至经济学



2016 年底，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邹至庄夫妇决定在厦门大学设立“邹至庄经济学教育基金”，以进一步推动中国和厦门大学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发展。

院每年入学的全部新生，人数规模大致在 500 人左右。

事实上，单单开办一个实验班进行英文授课并不新鲜，但是要实现整个年级各专业学生的全英文授课，势必需要全面创新本科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国际化实验班绝非仅仅是教学语言的调整，不单单是学生培养形式的创新，更多牵涉的是机制与体制的改革。有人质疑，用英文上课，这不是全盘西化了吗？其实，此举确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增强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适应了培养国际化经济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

举个例子，目前在国际组织中，中国雇员比例很低。例如，世界银行约 1 万名员工中，约有 200 名中国人。中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聘用了大约 3200 人，其中约有 50 名中国人。中国职员在国际组织供职比例很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严重缺乏“善于交流”的专业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另一个例子，美国一流大学要求其本科生到国外大学交流学习一个学年，学分可以互换。很少美国学生到中国高校学习交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高校至今还无法实现专业课程全英文教育，从而失去了向外国学生传播中国价值观和中国声音的机会。

文汇报：按照国际通常的说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15% 以下的属于精英化阶段，15%—50% 的叫做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 50% 以上的被称为普及化阶段。今天，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40%，计划 2020 年提高到 50%。在高等教育普及率越来越高的今天，提升教学质量就显得

尤为重要。您对于提升本科教学质量方面，有哪些思考？

洪永森：在国内，一个经济学专业本科生一个学期能够修 8 到 10 门课。在国外，如果一个学生一个学期内修 5 门以上课程，大概已经不堪重负了。以康奈尔大学为例，22 个学分是条“警戒线”——不允许，或者说不鼓励学生修课过多，以防囫圇吞枣的现象出现，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乃至学业的完成。如果一个学生选课超过 22 个学分，则需经过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特批。按一门课 4 个学分计算，22 个学分对应 5.5 门课。

一个学期修 10 门课，学生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对此我不甚知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每门课的内容都不会太充实，学生的学习不可能太深入。到厦大经济学院后我才发现，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罢，很多课程每星期只上一次课，一次课三、四小时。老师开心，因为下了课这一周就轻松了；学生也开心，因为下了课他们就可以把这门课丢在一边了。

但是，这样的学习效果肯定不好。于是，我们把一次课拆成两次课，且安排隔天上课，这样学生才有消化的时间。经济学讲究“边际效用递减”，学生在课堂上坐得越久，其吸收知识的能力就变得越差，教学效率与质量都会有所降低。

我们在经济学院启动这项改革的时候，一二年级的本科生还在与厦大思明校区隔海相望的漳州校区学习。老师们每次上课，都要一大早乘了轮船赶去漳州，其中的辛苦不言自明。原来教师上一门课一周赶一趟漳州校区，现在变成一周两趟。于

是，那时候有个笑话，说每天早上在去漳州校区的轮船上都能听到在抱怨我的声音。一个学期下来，很多老师反馈说，他们的备课量增加了三分之一。课程效率提升后，学生的课量、作业量也同时加大。听了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们想要的效果达到了。于是，我们得出结论：一个学生一个学期修 10 门课是不科学的。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着手进行包括课程设置在內的一系列改革工作。去年年底，我们刚刚集齐经济学院所有课程的中、英文介绍。令人惊愕的是，这个成立了 30 多年的学院竟从来没有一份完整的中文版课程介绍。对于国外高校而言，这些材料是最基本的。它们告诉学生，某一门课在哪个学期开设、课程内容大致如何、占几个学分、前修课程包括哪些，等等。这些清清楚楚的标注，对于学生选课很有指导意义，同时，也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相比较而言，国内多数院校的教学安排往往只从“供给侧”出发，忽视了学生的“需求”。

我想，十年以后，中国高校将会进入高度的“生源竞争”阶段。这一点，现在已经初见端倪。到那时，你如果跟学生说“我们校园有多大，有多漂亮”，可能就不管用了。管理与文化软实力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其中包括“润物细无声”的思想教育、人文教育与诚信教育的能力。可惜，今天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文汇报：去年底，邹至庄夫妇决定为厦门大学分批